

AGNES SMEDLEY

史沫特莱文集

BATTLE HYMN

OF CHINA

1

115/1

62013

史沫特莱文集

中国的战歌

袁文 賈树榛 袁岳云译

1

新 华 出 版 社

据美国纽约阿夫列德·克诺波夫出版社
一九四五年八月第四版译出

史沫特莱文集（一）

中国的战歌

袁文 买树榛 袁岳云 译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插页4页 15.125印张 313,000字

1985年9月第一版 1985年9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印数：1—7,000册

统一书号：10203·169 定价：3.00元

出版前言

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自一九二九年作为《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踏上中国国土开始，直到一九五〇年与世长辞，她一直献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中国人民跳动着同一脉搏。史沫特莱在她的《中国的战歌》一书中曾这样写道：“我一直忘掉了我并不是一个中国人！”

就是在一九五〇年她缠绵在伦敦病榻的时候，还在深情脉脉地说：“我可能再也看不到中国了，无论如何我已经知道新的中国政府终于成为现实，世界再也不会象老样子那样了。……假如哪一天我能重返中国，我一定要亲一亲它的土地。”

一九五〇年五月六日，这位杰出的国际主义新闻战士终因忿忿成疾，贫病交加，溘然与世长辞了。临终前，她要求把骨灰埋在中国。她在给友人最后一封信中写道：“我自有生以来仅有一个挚念，一个信心，那就是为解放那些贫苦和受压迫者而努力工作。在这个努力中，我已看到中国人民革命在这方面的

1028/26

成就。我将多么愉快地看到中国大使的到来，在我的遗体旁唱中国的国歌——起来！

“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将使我的心灵得到安息。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许多中国革命烈士放在一起。”

史沫特莱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追求真理和支持被压迫的人民求解放的一生。艾格尼丝于一八九〇年出生在美国西部密苏里州一个贫穷的工人家庭。在她幼年的时候，家贫如洗，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母亲在给人家洗衣服，做杂工；父亲则在科罗拉多州洛克菲勒家族经营的矿上当矿工。这贫困潦倒的一家人，依靠史沫特莱一个当妓女的姨妈的帮助，才免于陷入绝境。

贫困和苦难早就在史沫特莱的心灵里播下了反抗的火种。她如饥似渴地学习，她在茫茫黑夜中追求真理，她向往人的尊严和独立自由，她憧憬一种富有意义的生活。在她十六岁那年，母亲因劳累过度、营养不良而悲惨地死去，这使艾格尼丝十分伤心。为了摆脱那吞噬了她母亲的青春和生命的厄运，史沫特莱毅然离家出走，开始了长期的半流浪生活，去摸索自己的人生道路。在艰难的岁月里，她当过报童、侍女、烟厂工人和书刊推销员等。她依靠顽强的意志和刻苦的自学，居然在十九岁那年考进一所师范学院，并以优异的写作才能当上了学生刊物的编辑。后来经常为进步报刊撰稿，写了不少抒发正义、揭露黑暗社会、同情劳动人民的富有战斗性的作品。

一九一六年，史沫特莱来到纽约，开始投身于火热的政治生活。她一方面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号角》周刊和女权运动刊物《节育评论》撰稿；一面支持印度流亡者争取民族独立的

斗争。由于她积极参加这些进步的政治活动，一九一八年三月，史沫特莱在纽约被捕。根据“反间谍法案”被指控为企图煽动反抗英国统治的叛乱。直到一九二三年，联邦法庭对史沫特莱的指控才正式撤销。出狱后，根据她亲身的经历，撰写了她的第一部文艺作品《铁窗难友》。这时她获悉，她的一个弟弟已被送往欧洲战场去当炮灰，行前，他曾要求见一见被无理关押的姐姐竟不能如愿；她那当小工的弟弟也在一次工伤事故中死去。史沫特莱义愤填膺，严酷的现实使她的思想更加激进了。因此她出狱不久，就积极投身于支持印度民族革命运动的洪流中。她编辑新闻通讯《印度新闻》，担任“自由印度联谊会”的执行书记，并为该组织筹款、撰稿。后来由于接连受到反动当局的迫害，她才被迫离开美国，前往柏林。

在德国期间，史沫特莱除了继续支持印度的民族革命外，还积极参加了争取男女平等权力的活动。她与美国女权运动的领袖玛格丽特·山额夫人保持密切的联系，并于一九二七年请山额夫人来德国进行了一次巡回演讲。一九二八年，她在柏林开设了一个节育诊所。此外，史沫特莱还在柏林大学教授有关英美的课程；同时，她又劝说校方同意，作为一名学生攻读印度历史博士学位。在此期间，史沫特莱用德文写了大量文章，其中有许多是写给学术性刊物，并且绝大部分都是关于印度历史和妇女问题的。显而易见，史沫特莱还是二十年代德国知识分子舞台上十分活跃的人物。她同德国著名的女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成为好朋友。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德国的《法兰克福日报》在头版连载了她的著名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

一九二九年初，史沫特莱作为《法兰克福日报》的记者来到中国。她一到上海，就被中国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所感动了。中国人民的朋友、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在他的著作中，对史沫特莱作过一段逼真的描述：

“她看到在夏季炎炎烈日之下，一伙码头工人，肩上套着绳子，吃力地拉着装满货物的木板车。突然，一个满脸胡子的大个子印度巡捕出现了。为了给一辆里面坐着一位傲慢的外国官员的闪闪发光的黑色小轿车开路，他竟然殴打工人们汗水淋漓的光脊背。那时，她感到警棍好象打在自己身上一样。看到一个被压迫的民族，如此对待另一个被压迫的民族，她不禁感到耻辱。她自言自语地说：‘凡是有胆识的人，在这块大地上一定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她当时就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坚定地表示了要献身变革这一制度的伟大革命。”

当史沫特莱初到中国时，正值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共产党人和其它进步人士，横遭反动当局的逮捕和杀害。具有崇高国际主义精神的史沫特莱，对旧中国内忧外患、满目疮痍、黑暗腐败的种种状况深为忧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深表同情，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慨。为了把中国革命真相向全世界传播，她决心长期深入生活，和中外进步作家、新闻记者一起，“搬走这座封锁中国的大山”，打开世界人民的眼界，使他们对战斗的中国寄予同情和希望。

在此期间，史沫特莱尽管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迫害，但她毫不畏惧，勇敢战斗。她不仅用自己锋利的笔写了许多充满激情的文章，揭露黑暗，歌颂光明，首次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江西苏区情况传播到国外去，而且还协助宋庆龄成立了“保

卫人权同盟”，利用她的交际才能和记者身份，团结了许多进步的中外朋友，向全世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黑暗暴政。为了支援以鲁迅为首的中国进步作家的斗争，她曾暗暗地保护过许多革命者，并把自己的家作为通信联络点和聚会场所。一九三一年二月，青年作家柔石、李伟森、殷夫、胡也频、冯铿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鲁迅在悲愤之下写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一文，要求译成外文送到国外发表，史沫特莱毅然担负起这一工作，终于把这篇战斗的檄文发表在当时美国的进步刊物《新群众》杂志上。

抗日战争前夕，一九三四年底，史沫特莱第二次来到中国，她虽然重病刚愈，却毅然前去中国西北采访。一九三六年，她在西安期间，亲眼目睹了震动世界的“西安事变”。她把张学良将军扣押蒋介石的真实情况用英语向全世界作了广播。一九三七年初，她到了延安，访问了许多革命战士和干部，并同朱德总司令作了频繁接触，要求为他写传，介绍他的生平。史沫特莱认为，中国人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代表农民利益的革命者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如果朱德同志把身世告诉她，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这是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被压迫的阶级所最关心的事情。为此，她进行了大量采访，并在战斗中实地观察达一年之久，为日后写朱德传记积累了大量的材料。

抗日战争开始后，史沫特莱不顾个人的安危，随军转战各地，写了大量文章，介绍中国的抗战情况。她以道劲感人的通讯促使中外记者和进步人士去延安亲眼见识那里的火热革命斗争。在硝烟滚滚的战场上她不仅用她那锋利的笔锋抒发着她对

浴血奋战中牺牲的战士们的深厚同情，而且还到处奔走呼号，为中国伤员在国外募捐，在国际上赢得了许多进步人士和医药界朋友的巨大援助，并促成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她还动员和组织了包括白求恩、柯棣华在内的一批加拿大和印度医生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工作，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沦陷，她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身份，身着戎装，随八路军、新四军转战华北、华中和华东，写了许多著名的战地通讯和报告文学。受到国内外人士的称赞。当敌寇对新四军驻地狂轰滥炸时，叶挺军长劝她离开目标较大的军医院，她坚决要与战士在一起；当斗争形势日益残酷时，朱德总司令也劝她转移到敌后较安全的地方，她执意不去，她说：“为什么和我谈死亡的危险，你们不是也经常面临着死亡吗？让我也跟你们一样生活吧，我不想死，我也尽力做到不死。但是，如果我一定要死，就让我死在这里吧。我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许多城市象污水坑一样，我生活在那里就感到痛苦以至病倒。但是你们的部队却恢复了我的健康。这是因为这支队伍是中国和亚洲的希望。只有在这里，我的心情才平静，我的精神才振奋。”她还说：“你们的人民也是我们的人民，因为我是属于大地的，我们的斗争也就是整个大地的斗争。”史沫特莱就是以这样高尚的情操和伟大的胸襟来看待和参加中国革命斗争的。

究竟什么力量使史沫特莱嫉恶如仇、追求光明和奋不顾身地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呢？她在《大地的女儿》一书中，生动地描述了她为什么不忘自己的阶级出身。她从不忘记她辛酸的童年

以及她难以忍受的逆境。这也是她为什么远离她热爱的祖国和人民，来到陌生的中国，并把她的整个后半生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的真正原因。当她预感到中国革命的成就，已经是那些贫困的、被压迫的人民的解放事业的中流砥柱时，就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中来。

史沫特莱认为，她在旧中国的一切行动中心，“在于要预告中国革命的发生”；她认为她自己全部历史的任务，在于挖掘和发现“中国社会生活的潜流”，并且观察这一潜流究竟要流向何处？经过十年的观察和深入调查，她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和他们队伍中忠诚的党员，中国工农红军的领导者到绝大部分的指战员，他们都是全人类中出现的新人，是在旧中国具有全新思想、在当今历史中具有全新风格、高尚情操和坚实理想的新人。史沫特莱十分振奋地写道：“在他们身上，一个全新的成份进入了中国社会。”而且她还坚信，这不仅是中国的希望，而且这是亚洲的希望，全世界被压迫国家的希望。

正是基于这一远见卓识，她以惊人的毅力排除万难，致力于介绍中国。她在积极参加社会进步活动的同时，撰写了大量介绍中国革命斗争的通讯、报告、杂文和短篇小说，数量约达二百万字。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的：“这位伟大的美国人，在专心写出更多更好的革命回忆录和革命传记文学作品方面，做出了卓越的成绩，这些作品对中国革命的历史是一个宝贵的贡献。”史沫特莱对于她的作品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感到莫大的骄傲与欣慰，虽然她受着贫困与疾病的折磨，但她仍把所得到的一切稿费和讲演费拿来救济中国战区和灾区的孤儿。就是晚

年在贫病交加、处境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她仍在致力于介绍中国革命，从事《伟大的道路》一书的写作。

一九四九年二月，在美国反共的麦卡锡主义的狂暴里，史沫特莱蒙受了不白之冤，美国陆军当局宣布她是“苏联间谍”。这一罪名使她受到了残酷的虐待和折磨，她几乎没有栖身之地。到处都是关于史沫特莱是共产党或是“卖国贼”的传闻。所有这一切，使她不可能找到工作来维持生计，而且剥夺了她集会、讲演甚至出书的权利。就在这一年的八月，曾经和她签订过《伟大的道路》一书的出版合同的美国一家出版社，突然向史沫特莱提出，说她在书稿中对中国革命的意见是教条的，强迫她进行修改，并加进反共的内容，遭到她的断然拒绝。表现了宁死也不弯腰的革命精神。

但是，就在她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她从广播里听到了她曾经致力于奋斗的新中国诞生的消息，她激动万分。由于当时的美国政府拒绝给她来中国的护照，史沫特莱决定取道欧洲来华。多么遗憾啊，就在她在伦敦停留期间，病魔夺去了她的生命。对于史沫特莱的逝世，中国人民是十分悲痛的，为了实现她生前的愿望，一九五一年五月六日史沫特莱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她的骨灰安葬在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墓前竖立着一块大理石墓碑。碑上镌刻着朱德元帅亲笔书写的金色题词：“中国人民之友 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鲁迅说过：“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的死掉了。”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杰出的作家和新闻记者，新华出版社决定出版《史沫特莱文集》。这套文集含有四卷，主要搜集了史沫特莱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其内容是：

第一卷《中国的战歌》(Battle Hymn Of China)。书中详细介绍了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四一年她在中国的见闻，真实地记载了她在 中国革命圣地延安以及随八路军、新四军转战华北、中南和华东抗日战场的情景，报道了中华儿女的英雄业绩，生动地向世界人民介绍了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真实情况。此书自一九四三年在美国出版后，连续再版，受到各国读者的热烈欢迎，被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优秀的报告文学著作。

第二卷收有《中国红军在前进》(China's Red Army Marches)和《大地的女儿》(Daughter Of Earth)两部著作。

《中国红军在前进》又名《中国红色风暴》，写的是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二年间，中国人民为谋求统一团结、和平奋斗救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红军作先锋同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投靠帝国主义、镇压国内进步力量的国民党反动派奋起作战，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五年建军史诗。这部书一九三四年在莫斯科首次出版，以后在西方连续再版。

《大地的女儿》是史沫特莱的自传体小说。书中生动翔实地描述了她幼年和青年时期的苦难经历和父母的悲惨命运。最后她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参加了工人运动，变成了勇敢的革命者。又经过刻苦自学，成为著名的作家和新闻记者。这部书是她来中国的前一年即一九二七年写成的，一九二九年初版，以后连续再版。

第三卷《伟大的道路》(The Great Road-The Life And Times Of Chu Teh)。这本倾注了史沫特莱全部心血的书，不仅记录了中国人民敬爱的朱德同志六十岁以前所走过

的道路，同时也生动地展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一幅壮丽多姿的画卷。这本传记著作具有它独特的风格。作者把自己置身于书中，并以她非常生动、细腻和隽永的笔触，刻画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栩栩如生的形象；逼真地记述了她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介绍了英雄的中国人民及其领导人在缔造新中国的过程中所创造的史诗般的事迹。这本书自从一九五五年以日文译本初版问世以来，世界各地又先后出版了德、俄、法、西班牙、孟加拉、丹麦、意大利等八个语种的译本，在各国进步人士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本书同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样，成了有关中国革命史的名著。

第四卷收有《中国在反击》(China Fights Back)和《中国人的命运》(Chinese Destinies)。

《中国在反击》是一本日记体、书信体的书，记下了史沫特莱从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到一九三八年抗战初在华北地区的生活和经历，她不畏艰险，深入前线和八路军、游击队在一起，书中主要反映了当时华北地区抗日的政治和军事形势。该书一九三八年由美国先锋出版社出版。

《中国人的命运》主要反映了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期中国的动荡社会生活、阶级矛盾和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作者通过对当时社会现状的调查，对各阶层人的接触了解，以一个记者的锐利眼光揭穿了旧中国的社会弊端，并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寄予无限的同情和支持。该书在一九三三年先由美国先锋出版社出版，后又再版过。

《史沫特莱文集》除《大地的女儿》和《伟大的道路》两书在国内出版过外，其他均为首次在国内出版发行。这次出版

时，对《大地的女儿》和《伟大的道路》某些译文又作了润色和校订。

《史沫特莱文集》的出版，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正在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宏伟事业的中国人民，这些记述了中国人民和其它被压迫人民历尽艰辛和英勇斗争的书，既是极好的纪念品，又是激励人民为实现崇高理想而坚决战斗的重大动力。重温她的经历，使我们缅怀过去，展望未来，更加奋发前进；对于中国年轻的一代来说，尤其具有重要的价值。一切有志之士可以更好地学习她不畏艰险、坚持真理的献身精神，学习她热爱人民、深入实际的优良作风，学习她毕生致力于人民的解放事业、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团结互助的高尚理想。为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光和热。

史沫特莱和斯特朗、斯诺一样，他们的许多优秀品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们在黑暗的中国点燃起信息的火炬，而这火炬又曾得到广泛的传播。他们真正是国际新闻界中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正如邓颖超同志一九八四年九月致三S研究会的信中所说的：“三S虽然是美国人，但是三S从三十年代起就热爱中国，先后来到中国，他们不避风险，不顾自己的安危，不断地把中国各族人民的革命和胜利，以及在旧中国各族人民所受的苦难情况，介绍给世界各国人民，以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更加兴奋，不知疲劳地为新中国服务，直到他们的生命终止，还留下遗嘱，把骨灰埋在中国的土地上。这是多么感人，又激励我们热爱中国，发扬国际主义的永恒动力啊！三S为中国各族人民所作的贡献是难能

可贵的，也是难以估量的。我们要向我们三S的老朋友致以衷心的感谢！向他们学习！”

我们愿三S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愿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演奏出更加雄伟更加庄丽的《中国的战歌》！

新华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四月

献 给

世界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中
穷苦的光荣的先锋中国的战士们



作者像